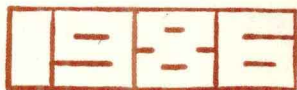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

辑

历史研究

第 2 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某些出于反动政治宣传目的,蓄意捏造、歪曲或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管理,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

历史研究(2)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6)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剪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6印张 154千字

1987年3月北京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 11201·57 定价: 1.55元

〔内部发行〕

目 次

论 著

历史的解释

王曾才 一

周公何曾辅成王? 文武周公合论读后

王茂富 七

文武周公合论

任卓宜 一四

王莽与周公

王茂富 一九

古代史

宋代官员数的统计

李弘祺 二三

北宋方田考(上、下)

侯家驹 三六

杂谈有关元史五事

袁 冀 三八

有关元史札记四则

袁 冀 四二

近代史

清末新民丛报、东方杂志和民报

对立宪的意见(上)

朱浚源 四五

民族史志

从阿鲁台到额鲁特

张哲诚 六二

谈蒙古历

郑天杰 1

史学家

钱穆大师自学成名(二)

程榕宁 六四

柳诒征先生传略及其著作目录

《文艺复兴》编辑室辑 六八

学术研究

记“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

王明荪 七九

香港大学中国中古史国际研讨会

高明士 12

歷史的解釋

王曾才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好，聽說各位都是愛好文藝的先進，我個人因為是學歷史的，所以，當初找我來講演的時候，我一再的敬謝不惶。不過，主事的先生對我說文史不分家，也就基於這樣的一個諒解。因此，我來做一個很膚淺的報告。

今天所要報告的題目是——歷史的解釋：

我想，從一個最廣泛的意義來說，每一個人都是在生活在歷史之中。也就是說，除掉未來以外，人都是生活在過去之中。人永遠要從對過去經驗的判斷、評價、肯定或者否定它的意義，來選取立身處世的依據。所以，就這個意義來說，不管個人是不是研究歷史，每個人都會是自己的歷史學家。對於文藝界的朋友而言，不論寫作或者是作品的欣賞，都可以透過個人的經驗而有更真切的領略，而創作更是透過一種表現的方式，把經驗或感受表達出來。不過，在今天我們所講的歷史的解釋，還是偏重於一般人所瞭解的歷史。

所謂歷史解釋，是指給歷史事實一應得的評價，闡明歷史事實之間的因果關係，從而透視歷史事實背後的意義。我們知道，歷史事實的本身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對於歷史的研究工作就不定能够完全客觀。研究歷史的人曾經有過很大的宏願，希望把

歷史研究的工作能够當做一個完全客觀的工作來進行，過去，也曾經有很多人認為這一點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在現在有些歷史界的朋友已經覺得這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因為在歷史敘述與歷史事實之間，也就是當我們敘述一件歷史事件時與這件歷史事件的本身之間會有很大的差距。這個差距相當於地圖與地理實際狀況的差距。就我們所瞭解的，從地圖上我們所看到的某個地理區，它的高度如何？它的緯度如何？乃至其它的地理狀況如何？這與實際上真正的情況會有很大的差距。同樣的道理，如果牽扯到歷史的解釋，也因此而會有着很大的差距。我們常常看到，對於歷史事實的結局，除非是有意捏造歷史，否則是不會有太大的出入。由於歷史事實太多，我在這兒不一一的舉例。但是對於特殊歷史事實的意義，乃至於影響，就有很不同的說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我想，我可以檢討一下，提出幾個可能會影響歷史解釋的因素，就教於各位女士與各位先生。

第一個會影響歷史解釋的因素，如果借用心理分析學派大師卡爾因的說法，就是集體的潛意識。什麼是集體的潛意識呢？即作為一個文化成員，一個特定的社會一分子，在不知不覺之中所承襲到的一些潛意識裏的因素，而這些因素會對於其價

值判斷產生，甚至於很難覺察得到，很難能够排除掉的影響。換句話說，也就是每一個社會，每一個人羣都有各自的一種說法。

舉例來說：上帝用他的形象來塑造人類，所以任何一個人類社會所供奉的神也是像人的樣子，這個情況，就是上帝肖人。早在古希臘時代，一位哲學家叫做贊諾芬，他就談到了這樣的一個情況。他說：「伊索比亞人所畫出來的神像，必然是黑膚、象鼻（黑顏色的皮膚，像大象一樣的鼻子）；色雷斯人所畫出來的神像，必然是紅髮、碧眼；如果是牛或者是馬，也有手，也有神的信仰，也能够畫神像的話，那麼，馬所畫出來的神像一定是馬，牛所畫出來的神像也一定會是牛。

我想，我們還可以從其他的一些事例來看，就是關於審美的觀念。「美」在中國歷史上是有些演變的。像漢代認為是苗條為美，輕盈為美，所以美的典型，美人的標準是趙飛燕，所謂「可憐飛燕倚新妝」，是一個我見猶憐，人見更憐的形象。而唐代美的標準則是以豐滿為美，所以美人的典型就是楊貴妃（楊玉環）。我們說燕瘦環肥，各位一定都比我還清楚，燕是代表趙飛燕；環是代表楊玉環。究竟是燕瘦，還是環肥為「美」的最高標準呢？當然，在今天我們來看，我們會感覺到這種的爭論

已經是沒有什麼意義了。因為「君不見玉環燕飛皆塵土」，她們都已經成為了過去，完全變成了黃土一抔。還有什麼可以爭論的餘地呢？同時，經過歷史的演進，經過人對於美有了一種綜合的感受之後，會感覺到燕瘦有燕瘦的美；環肥有環肥的美。但是，這對於當時的當事人而言，卻並不是如此。大家如果想像一下，楊玉環是生在漢代；趙飛燕是生在唐代，恐怕這兩個人的遭遇就會完全不一樣了。就她們兩個人的個人遭遇而言，她們會深深的感慨到是「上錯天堂投錯胎」；至於，牽扯到她們兩個人的歷史，也勢必也要為之改寫。

我再舉一個有關歷史著作方面的事例，各位都知道，十八世紀英國的大史學家吉朋，他寫了一本很有名並且已經是經典性的著作叫做羅馬衰亡史。研究歷史的人或許不一定都看過這本巨著，但是相信對於它的價值是不會給予太否定的認定。可是這本書是寫作於十八世紀，十八世紀是一個非常強調、崇拜理性，非常藐視信仰，甚至於譴責信仰的一個時代。吉朋受到這樣的一個時代風尚的影響，以至於在他寫作羅馬衰亡史時，不自覺地，對於基督教一直是採取一種否定的評論，給予否定的評價，而且認為羅馬的衰亡與基督教的興起有着很大的關係。

由以上的例子當中，可以說明一種狀態，那就是任何多麼超越的心靈都沒有辦法完全擺脫其所生存的那個時代；所生活的那個社會，所加諸於其在價值判斷方面的影響。

所以，一位很有名的美學大師克羅齊，這個人

是一位很有名的史學家；也是一位很有名的文學評論家，他曾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他的意思，我想，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一個就是對於歷史的創造者而言；以及跟歷史創造者同時代的人而言，他們永遠認為他們是當代的人物，無論是氣吞山河的亞歷山大，還是橫槊賦詩的曹孟德，他們都沒有想到他們是古人，也絕對不可能想到他們是古人。另一個意義則是，任何人都是根據他自己的懷抱，根據他自己的價值標準去判斷歷史。因此，歷史常常會不斷的改寫，造成某一本著作或者歷史讀物，在某一個時代洛陽紙貴，很受羣衆的歡迎，而到了另一個時代或許就很難再找到知音，甚至可能變成一本被塵封的著作，冷藏在圖書館裏。

第二個可能影響歷史解釋的因素，就是任何問題都可能因為不同的角度而有不同的看法。

譬如蘇東坡很有名的一首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同樣是一座廬山，可是就因為觀測點的不同，橫看是一種感受，側看又是另一種的感受。王陽明也說：「山近月遠看月小」，山距離我們很近，月亮距離我們很遠，以地球做為觀察的根據地，就會感覺到山是大月小，這個道理就是因為山近的關係，所以才會給我們這樣的印象和瞭解。但是，印象並不是客觀存在的，有太多情形可以說明觀察點的不同，而會有着不同的感受。

又比如說：有一種說法，二郎廟之前有幾棵樹，人皆曰：「樹在廟前」，我獨曰：「廟在樹後」。

中國有兩句勸世良言，一句是「萬惡淫為首」；另一句是「百善孝為先」，這也是普遍為大家所接受的一種說法。可是有人却在這兩句勸世良言裏加上條件句，就使它呈現了另外的一種意義。「萬惡淫為首，論事不論心，論心互古無完人；百善孝為先，論心不論事，論事寒門無孝子。」也叫人覺得很有說服的力量。

還有，據說在一個茶葉店裏，有兩個女店員，一個女店員非常受人歡迎，客人去買茶葉總是喜歡找她打交道。而另外一個女店員却非常受冷落，這個女店員並不是面貌醜陋的人，為什麼顧客不喜歡和她打交道呢？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後來，發現這個受歡迎的女店員，每當客人來買茶葉的時候，她先抓出一些茶葉，然後再一把一把的往裏放。另外那個不受歡迎的女店員，習慣每次都多抓一些，然後再一點一點的往外拿。這樣，結果就給了顧客很不同的感受。

學心理學的朋友常常談到一個例子，兩個牧師對抽煙與禱告可否同時並行，有不同的意見。一個認為抽煙和禱告可以同時並進；一個則認為絕對不可以並行，爭論的非常厲害。後來，他們就向上級請示。請示的結果，最後兩位牧師都說他們得到了勝利，都說上級支持他們的論點，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經探尋發現這個主張抽煙和禱告可以同時並進的牧師，他所問的是，請問：「抽煙的時候能不能禱告」，上級說：「禱告是一個基督教徒靈修生活的一部分，是他在與上帝對話，他在需要的時候，

可以在任何方式之下進行，因此，包括抽煙的時候在內，如果沒有其他適當的時間，只有抽煙的時候可以禱告，也可以在抽煙的時候禱告。」而這個不贊成抽煙和禱告可以同時並行的牧師，他問的是，請問：「禱告的時候能不能抽煙」，上級說：「絕對不可以」，因為禱告是一個基督教徒靈修生活的極致，他是在和上帝對話，他是在做一件最嚴肅的事情，他絕對不可以抽煙。

我想，西遊記大家都看過，同樣是西遊記的故事，文學家的說法與政治家的說法就有著顯著的不同。政治學家把唐僧解釋成是一個握有主權的君主，他不一定有能力。但是，他是一個主權者；豬八戒只是一個喜歡打小報告的奸臣，他常常對於很多問題，引發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孫悟空則是一個能臣，一個非常幹練的行政家，可是他經常遭受不白之冤，為主權者所處罰，沒有任何反抗的餘地。文學家看西遊記裏的唐僧認為是代表人性，因為人性有很多的弱點，因此，他也不是一個自己能够保護自己的人，至少在上西天去取經，經過八十一難的歷程裏，他連獨善其身的能力都沒有。但是，由於人性是非常純潔的，因而所有的妖精都想吃他；孫悟空代表人心，心力是大而無邊的，心可以產生很大的力量，可是心也是多變的，孫悟空至少就有七十二變；豬八戒代表愚妄，他所做的儘是一些很窩囊的事情。這些窩囊的事，差不多都與食、色有關，所以給人愚蠢警戒不高的感受。

前年，在美國有一本很受商業界重視的刊物叫做「財神」雜誌，裏面提到一家美國的皮鞋公司，

想到非洲的史瓦濟蘭去發展業務，於是乎就派一位業務代表到史瓦濟蘭去考察，這位業務代表去了之後，寫回來的報告，表現得非常的悲觀，說是這個地方相當的落後，沒有人穿鞋，業務根本沒辦法推展。後來，公司又派另一位業務代表再去考察，而另外那位業務代表寫回來的報告，却說大有可為，說這個地方有極大的市場潛力，有那麼多的人竟然都沒有穿鞋，一旦他們決定穿上鞋子的話，則將會是一個多麼大的銷售市場。

軍隊裏面曾經有過這麼樣的一則趣談，說：「有一位連長，這位連長每次遇見違反軍紀的士兵時，他就對違反軍紀的士兵說：或者是我跟你較量三回合，或者是打你三軍棍，由你選擇。但是，當他處罰違紀士兵的時候，違紀的士兵如果說：『願意接受三軍棍』，他就會說他懦弱、膽怯不像個軍人；如果違紀的士兵說：『願意選擇比賽三個回合』，他又會說他是欺侮老年人，欺視他年紀大了，不用了。總之，不論怎麼說，這位連長都有不同的理由，來解釋他所執行的處罰。」

再舉一個西方史學家的例子，不論從那個角度來看，西元一九一七年在俄國所發生的革命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有著極密切的關係，這個事實是可以成立的，可是對於它們之間何以有著如此密切的關係，却有著不同的說法。舉兩個俄國史的權威，也是俄國問題專家，就他們的看法來簡單的說一下。一位是利阿坡·漢穆生，他認為，俄國本來在西元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年）就已經要爆發革命，甚至於早在西元一九一四年以前就

將要爆發革命，可是到了西元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爭爆發的初期曾經引起俄國人民極強烈的愛國狂熱，因此，使得沙俄政權能够又延續了兩年多，於西元一九一七年三月，才發生第一次革命。另一位是喬治·肯楠，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如果是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的沙俄政權還是可以繼續下去，就是因為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才爆發革命的。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個現代化的戰爭，也是戰爭論裏（克勞賽微英的戰爭論）所討論到的一個全面性的、無限的、絕對的戰爭。本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所謂的無限的或者是絕對的戰爭，只是一個哲學的背面而不是事實。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却說明了這是一個事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戰爭的性質可說是完全的改變了。肯楠的理論認為，以俄國當時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經濟發展以及交通運輸等，都沒有資格、沒有條件、沒有能力來承當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樣的一個現代化的、全面性的戰爭，所以才發生了許多的問題，因而政權才崩潰，導致了西元一九一七年的革命。

我們知道，很多的問題，本來就是仁者見於仁；智者見於智。因此，很多的問題，因為觀察點的不同，所得到的印象自然也就會完全的不同。

第三個會影響到歷史解釋的因素，就要牽扯到歷史學家研究的方法，各人的用心以及主觀的喜憎。

首先來談有關歷史學家的研究方法。研究歷史如果完全用傳統的方式研究與用科學整合的方式研

究，是會有很不同的見解。舉例來說，研究宗教史。在宗教史上，馬丁路德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是發動宗教改革的先導者。同時，馬丁路德這個人也是一位很富有爭議性的人物。所謂很富有爭議性的人物，就是舊教（天主教）的史學家對馬丁路德

有一種評價和看法；新教的史學家對馬丁路德又有另外的一種評價與看法，新、舊兩教派之間，因而也就有着某些的異議爭論。有的當然特別尊崇馬丁路德；有的却並不那樣的尊崇馬丁路德。不過，大體上還是肯定馬丁路德的地位，肯定馬丁路德的價值，這是不成問題的。可是，美國一位很有名的歷史家艾理生，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心理分析學家，他將心理分析和歷史結合在一起，也就是以心理分析

的手法來研究歷史。因此，他對於馬丁路德又是另外的一番見解。他寫了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叫做青年路德，他描繪馬丁路德是一位心理不平衡，內心有着很多的緊張、衝突，遭受很多的挫折，並且一直就心自己不能得救，一直畏懼於上帝的偉大和沮喪於自己的渺小。最後，終於在西元一五一七年發動了宗教改革，這樣的描繪與普通的宗教史學家所描繪的馬丁路德是完全不一樣的。

其次，有關史學家的用心方面。我想，舉幾位我們中國的歷史學家，特別是近代的幾位歷史學家的事例，就可以把這個觀念講得很透徹。

我們知道，研究史學與從事文學創作是有許多共同之處的，文學創作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課題，它實際上是想表達一個什麼樣的主題，刻劃一個什麼樣的形象，即使看來好像是雜亂無章，根本沒有時

間順序的意識流派創作，至少也是反映了一種時代的精神。歷史研究的史學家有的時候也是以反映時代，希望能夠給予國家、社會一些正面的貢獻，也從事於歷史的著作，以抒發個人的心得，基於個人用心之不同，往往會曲註了歷史的解釋和理論。

在最近的七、八十年裏，我們可以看到，不斷的有某些歷史學家的作品出現，而且受到歡迎，廣泛的被閱讀。比如說，關於中國史方面的討論，最早像章嶽等這一類的歷史學家，由於他們在寫作的時候，仍然認為君主政體是一種非常自然的，普遍為中國人所接受的政體。因此，他們注重敘述、分析朝代的循環，以一般人所歡迎的方式來敘述、分析和解釋歷史。

接着，到了呂思勉、羅爾綱的時代，在那個時代正是軍閥割據、軍人亂政、政令不能貫徹以及嚴重的外患威脅，以至國家貧弱，不能夠振作。因此，他們傾向於反對地方政府，反對軍人勢力。像呂思勉所寫的白話本國史，是一本非常受歡迎的讀物，他描述歷史上的軍人都不可敬，都有某些缺陷，就連岳飛，他都認為是一種跋扈的軍人。這在當時那個時代是可以這樣寫作，可是到了後來，也就是大約二十年前，在臺灣的歷史寫作裏面，也有人如此批評岳飛，說岳飛跋扈，其實也不過是抄掠了呂思勉的書，就引起了軒然大波，被社會口誅筆伐。至於羅爾綱，他也做了很多有關歷史上藩鎮和太平天國這一類的研究，他也是因為感覺軍人亂政、軍人割據，所以他對軍閥這樣的現象口誅筆伐。沒有想到這些意見竟然被很多的美國學者，所謂的美

國漢學家梅谷等，這些人發展出一種叫做地區主義的奇怪理論。就是說，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就有割據、分裂、地區性的獨立傾向。旅居美國的華裔史學家，也是我們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劉廣京先生，他曾經寫過許多的論著，來駁斥這樣的看法和見解。

北伐以後，抗戰以前，蔣廷黻的著作非常的受到歡迎。西元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版的清華學報，登載了一篇蔣廷黻的「論琦善與鴉片戰爭」。這篇論著登出之後，便成了一篇非常有爭議性的著作。這個原因，我想，西元一九三一年也就是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的一年，在九一八事變以前，舉國上下就已有極強烈的抗日的情緒，九一八事變以後，更是舉國仇日，恨不得立刻與日本作戰。可是當時國力未豐，時勢艱困，如果與日本率爾宣戰，那正是日本所希望發生的一種情況，日本更可以很快的與中國正式作戰，很快的消滅中國。所謂三月亡華，並不是絕對不可能。在這樣的情勢背景之下，為了希望能夠對當時的國家、社會有所貢獻，所以蔣廷黻就寫了——琦善與鴉片戰爭，這篇論著。

論文中，他認為像琦善、耆英這種人，他們並不是一無是處，他們主張鴉片戰爭以後，與英國人解兵締約不要使戰爭擴大，避免兵戎戰亂。可是因為在清代的時候，一直就有所謂的剿夷派與撫夷派。剿夷派，從林則徐到徐廣進、葉名琛這一系統，他們主張對外國人應該不妥協，採取強硬的態度。蔣廷黻藉著這樣的一種歷史解釋，希望能夠對舉國仇日，而又不能對日抗戰的情況有所校正。可是，

這篇論著後來却成爲了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同時，有的人認爲蔣廷黻是有意的迎合當道，討執政者的歡心，以爲自己謀取一官半職；有的人則不贊同這樣的說法，認爲蔣廷黻並不是這樣的動機。或許蔣廷黻在爲「琦善與鴉片戰爭」以後，基於巧合，被徵召步入宦途，變成了政府的官員，並且一直扶搖直上。然而事實上，他也確實表現了他的才能，尤其是他的辯才無碍，使他成爲了中國近代一位非常傑出的外交家，曾經代表中華民國駐聯合國的常任代表。

抗戰軍興以後，錢穆先生的著作非常的風行，他所著作的一本國史大綱，至今仍然是一本非常好的著作。在國史大綱裏，錢穆先生所強調的就是抵抗外侮，振興民族大義，恢復民族主義，這種精神，在當時是非常能夠受到歡迎的。同時，藉着這樣的著作，對於當時的世道人心也是能夠有所貢獻的。今天，就是在校的大學生恐怕讀這本書的人也不太多，不再像抗戰期間那樣的普遍。

再其次，我還要再談一下，有關於歷史學家個人主觀的喜憎。我們誰都不能否認，人是很難擺脫主觀的色彩，很難排除主觀的因素。如果有一個人說：「我最客觀，我最不主觀」，恐怕這句話的本身，就是最主觀的陳述。有人曾經批評哲學，說：「哲學就是講出一篇道理的偏見」。我想，研究哲學的人一定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但是，至少有這樣的一種說法，而這樣的說法，正是一種主觀的各人

喜憎意味極重的說法。個人主觀的喜憎，既然是如此的難於擺脫、排除，對於研究歷史的史學家們而言，在他們論著歷史時，自然會對歷史的解釋有着極大的影響。

第四個會影響歷史解釋的因素，就是歷史解釋可能被用來當作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然後，完全的喪失了它所應有的客觀性。

從歷史上來看，無論是南朝反對北朝；秦反對晉；秦反對楚；楚反對秦；希臘城邦與波斯帝國之間的衝突；還是回教使與基督教徒之間的衝突，這都是須要用很多的理論，很多的歷史解釋作爲根據。不然，怎麼能够理直氣壯的反對對方呢？

舉一個最近的例子，所謂「冷戰」便是藉歷史解釋而導致的。在西元一九四一年，希特勒揮兵進攻俄國的時候，俄國爲了爭取西方國家的好感，與英國、美國、法國結成合作同盟，以對抗共同的敵人德國，於西元一九四三年，甚至把第三國際組織予以解散，以表示真心與西方國家和好。由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同盟是沒有可以永久維持的，連結同盟在一起的根本力量只有一個，就是對於共同敵人的恐懼。換言之，當共同的敵人非常強大的時候，是同盟間的盟誼最穩固的時候；當共同的敵人開始走下坡的時候，是同盟的盟誼關係開始緊張的時候；而當共同的敵人倒下去的時候，也就是同盟間圖窮匕見，不再能够維持任何關係的時候。

西元一九四一年至西元一九四四年底，當二次

世界大戰最激烈，納粹威脅最大的時候，俄國與英、美、法間的同盟關係，可以說非常的好。可是到了西元一九四六年，俄國有意打消原來的同盟關係，恢復原來對抗的狀態，於是，開始有意的找岔。西元一九四六年的二月，戰爭剛剛結束以後，不久，史大林即在莫斯科發表一個演說，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爆發，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國家互相競爭的結果，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了壟斷的階段，變成帝國主義以後，無可避免的結果。」這是列寧的理論，史大林以這種的理論來攻擊西方國家。同年的三月，英國的政治領袖邱吉爾，前往美國去訪問，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密蘇里州的一個叫富爾頓的小鎮接待他。在富爾頓時，邱吉爾也發表了一篇演說，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爆發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由於對侵略者的姑息。當納粹德國不斷的侵略歐洲各國時，歐洲各國都是以姑息的手法來適應，以至於促使侵略者得寸進尺，使得戰爭變得無可避免。他同時特別指出說：德國的鄰邦，尤其應該在姑息的政策上付較大的責任。」這當然是在攻擊俄國。接着，他還強調：「如果要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必須對於侵略者絕對不能再姑息，一定要對侵略者迎頭痛擊。」在這一演說裏，他同時還創下了「鐵幕」這個名詞，從亞得里亞海，到波羅的海出現了人間慘劇，形成了一道鐵幕。

這篇演說發表之後，所有的俄國能够控制的宣傳機器，俄國所謂的御用的學者，以及俄國附庸國家的宣傳機器，對邱吉爾展開了口誅筆伐，莫斯科

也立刻用了戰爭販子的字樣來攻擊邱吉爾。而當時在西方的許多國家，也開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次的事件，很廣泛的討論與解釋，這段期間有很多的著作出現，各種的說法、解釋都有，甚至與俄國同路人的說法也有。一個很少爲人所注意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冷戰，實際上也是藉著歷史的解釋，展開它的序幕的。

真正將歷史解釋當做一種政治鬥爭運用的工具，運用得最爲露骨的應該是中共。中共將中國歷史畫分爲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原始社會，第二個階段是奴隸社會，第三個階段是封建社會，第四個階段是半封建社會、半殖民社會，第五個階段是社會主義社會。然後以馬列主義、毛思想、階級鬥爭、人民起義做爲一個框框，生吞活剝，削足適履的來解釋中國的歷史，並且所有的歷史解釋都是在政治鬥爭之下產生的。

比如說：毛澤東立意要把江青的地位提高，變爲接班人的時候，大陸上的史學界，就以肯定呂后、肯定武則天的價值，認爲她們是了不起的人物，來迎合毛澤東的心意。到了西元一九七九年，或者是更早一點，很多的學者開始論著攻擊慈禧太后，西元一九八〇年各地都在盛演清宮殘夢，這可以很敏銳的感覺到江青要倒楣了，因爲慈禧太后正是影射在江青的身上，果不其然，四人邦倒臺，江青受到了公審。當今，鄧小平在大陸上推行四個現代化運動，反對他的人，藉著攻擊康有爲、梁啟超變法運動，因路線不正確，所以不能成功的方式來攻擊鄧小平。

一直到今天，大陸上都是說歷史的任務應該是爲政治服務，爲無產階級政治做主動、積極而熱烈的服務。由這些地方看來，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瞭解到，這是一種以歷史作爲政治鬥爭的工具。

最後，我想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我剛才一再的談到歷史解釋、歷史研究，當然是希望能够做到最客觀的標準，可是我仍然還是認爲歷史事實是客觀存在的，而歷史解釋却是很難客觀的。

我覺得研究歷史的人最好不要做一種有意的曲解；無意的曲解，如果不是用心可誅，或許不無可以諒解之處，或是給予某種程度的原諒。但是如果有意曲解，就會發生許多的問題。

怎麼樣才能够對歷史做比較正確的解釋呢？這當然需要比較正確的史觀。所謂史觀也者，就是對歷史的看法，基於這種的看法，而提出來的見解，當然就是一種歷史的解釋。

那麼，什麼樣的史觀，才是正確的史觀呢？我以為應該是民生史觀。因爲民生史觀是一個非常健全的态度，用民生史觀來解釋歷史能够給人一種非常積極、非常振奮、非常健全的感受。此外，民生所包括的範圍相當的廣泛，它包括了人民的生活，國民的生計，社會的生存，羣衆的生命，它是一個生生不息的觀點。因此，透過了民生史觀，自然會對歷史有比較健康、比較樂觀，也比較正確的解釋態度。（本文乃王教授在本會每月文藝講座講，由湯秀蘭記錄整理。）



散車父簋

周公何曾輔成王？

王茂富

文武周公合論讀後

一、引言

五六年前，由於一點偶然啓示，使我對於「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行政當國」之傳統說法，產生了懷疑。經過多方考證，發現武王崩時，成王已不幼。周公並非攝行政當國，而是自立爲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行政當國」之說法，出自王莽時期之捏造與訛傳。我已將如上之看法，撰成「武王崩成王不幼考」及「王莽與周公」兩文，承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先後發表。而周公輔成王之說，已深入人心兩千年之久。此種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絕非短短的兩篇小文，所能糾正者。而此一錯誤觀念，又非糾正不可。因爲周公是中國文化之祖。中國文化主要形成於周代。周公言行，實代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之主流。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易，而作春秋。孔子的一切學說之由來，很少不是祖述周公。如果不懂周公，不僅五經讀不懂，就算四書，你也很難讀通。論語八佾：

1.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2.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3. 林放問禮之本。

4.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大夫之家，八佾舞於庭，是失禮的。大夫之家祭祀宗廟，唱雍詩結束祭祀，也是失禮的。泰山爲天子所祭者，大夫去祭泰山，那更是失禮的。魯三家擅用天子禮樂，祭宗廟、祭泰山、從事家庭之禮樂，除了失禮之外，他們到底有沒有一點根據呢？他們唯一的根據，就是周公當爲天子，成王命魯國得用天子禮樂，郊祀文王與祭拜天地。中庸：

1.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達乎大夫，期之喪。達乎天子，三年之喪。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在這段話中，可以證明兩個問題。「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一句，證明周公繼承了文王、武王的天子地位，追王先公，並祀以天子之禮。其下半段，是周公制

禮的證據。須知制禮作樂，沒有天子地位，是不够資格的。

2.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周公制禮作樂，是中國任何一個中學生必有之常識。如果不知道周公曾爲天子，周公之制禮作樂，就講不通了。

由於周公的身世重要，凡是有礙周公身世之正確瞭解的錯誤學說，就非徹底澄清不可。澄清這些錯誤的惟一方法，就是各家各派把自己的觀點，全盤公佈出來，徹底討論，嚴格批評，得不出公認的是非，誓不甘休。經過大家多方努力，問題便自然解決了。

此一設想，自我初提此一問題時，就曾想過。天幸，當「王莽與周公」一文，於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六月號刊出時，適逢王莽先生所撰之「文武周公合論」一文，同時刊出。於此批評一下任先生的觀點，及對於我說略陳管見。對於歷史真象之獲得，將會是有幫助的。

二、任卓宣先生之論據

據我所知，任卓宣先生，是一位三民主義之理論家，當代政論家，對於史學，似無較深的認識。其他問題，暫置不論。謹將任先生文章中與史實不符之觀點，略舉數條，加以討論：

1. 直接繼承：任先生在討論孔子與文王的道統關係中提到，孔子的學問，是直接繼承於文王。文曰：

「看孔子吧！當他以貌似陽貨而被圍於匡時，却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可見孔子是直接繼承文王的了。」

任先生所用的「直接」二字，實在太欠斟酌了。孔子與文王，時隔五百年，地距三千里，孔子又有什麼方法直接繼承文王的學問呢？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這句話沒有錯。而任先生根據這句話，就作出「孔子直接繼承文王」的推論，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孔子繼承文王的學問，不但是間接，而且是經過了許多複雜過程的間接。問題之大者，約分四點：1. 如果不是武王伐紂成功，孔子有沒有繼承文王學問的可能？2. 武王雖然伐紂成功，而周公不封於魯，孔子有沒有繼承文王學問的可能？3. 周公縱封於魯，而魯國不建都曲阜，孔子有沒有繼承文王學問的可能？4. 魯國縱然建都曲阜，而孔子不生在曲阜，孔子有沒有繼承文王學問的可能？

由於武王伐紂成功，周公封於魯，魯國建都曲阜，孔子生在曲阜，這四大條件具備，孔子才有繼承

承文王學問的可能。

文王有七八個兒子，其中最賢者，首推周公，周公直接繼承文王的學問，自無問題。周公的長子是伯禽，伯禽直接繼承周公的學問，也應當沒有問題。孔子是魯襄公二十年生。魯襄公是魯國二十一代之君。自周公封於魯開始，中間經過伯禽、考公、偃公、幽公、魏公、厲公、獻公、眞公、武公、懿公、孝公、惠公、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等二十君，然後才至襄公。

襄公在位三十一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年，襄公薨年，孔子十一歲，還談不到什麼學問。孔子真正繼承文王的學問，應在昭公、定公五十年間。孔子繼承文王的學問，經過了兩大困難。武王伐紂成功，周公封於魯，克服地距三千里的困難。魯國都於曲阜，孔子生於曲阜，克服了讀者與書籍的困難。歷經二十三代，為時五百年，經過這麼多的周折，孔子才能接觸到文王的學問，怎麼能說孔子的學問是「直接」繼承文王呢？

2. 王而非帝：任先生引呂氏春秋的說法，證明周道成於周公輔成王。其說亦不正確。文曰：

「呂氏春秋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抱少帝成之。』」

這段話似是而非，表面看來，似有道理，而細按下去，則問題甚多。首先應當知道，呂氏春秋並非一部純正的史書。引證呂氏春秋辨證史事，基本上就有取材不當之嫌。且「周公抱少帝成之」，這個「帝」字，就犯了很大的錯誤。中國歷代的帝王，在黃帝以前，稱皇而不稱帝。自黃帝至殷紂，稱帝而

不稱皇。周定天下，非皇非帝，而獨稱王。秦始皇統一六國，既稱皇又稱帝，故曰「始皇帝」。自漢至隋，稱諡號，而不稱廟號。唐宋兩代稱廟號而不稱諡號。明清兩代，諡號廟號，均不當稱，而多稱年號。此為章節之大者，其分不可亂者也。

周室定天下，自武王至赧王，國君皆稱為王，沒有稱之為帝者。赧王時，雖有稱周君、王赧者，而稱王為帝者，絕對沒有。而呂氏春秋竟然稱「周公抱少帝」，實在是很大的笑話。

不管稱王也好，稱帝也好，王帝之別，不過是一字之差，此處暫不深論。而「周公抱少」四字，却是不能馬虎的。

「周公抱少……」當然是說周公抱成王。成王所以須要抱，不僅是少，而且是幼。孩童須抱的年齡，應在一歲至五歲。超過五歲的孩子，除非害軟骨病者，便不須再抱了。成王被抱的年齡，如從三歲計起，周公即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成王時年九歲。禮記明堂位曰：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這句話說明三個問題：1. 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是說周公居天子之位。2. 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天子是指成王，依南鄉而立，是說成王面北而立，面北而立，是臣子之位。這證明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時，周公居君位，而成王居臣位。這時的成王，既能負斧，證明成王已經成年。3. 周公即位之時，如果成王真是三歲，事過六年，不過是個九歲的孩子。一個九歲的孩童，是否能夠負起一件重兵器大

斧，姑置不論，而周公於朝諸侯示威於天下之時，而令一個稚齡小兒，負斧示衆，有沒有這個道理？

其次，周公居攝七年，讓位於成王，這是人所共知的事。成王三歲之時，周公居攝。居攝七年讓位於成王，這證明成王親政之年是十歲。十歲能否親政，暫且不管，先看看成王接受王位時之言行。周書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于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瀾水東，瀾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瀾水東，亦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俘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這是周公讓位於成王之時，周、成二人之對話。讓位的條件既已講定，擇日祭宗廟，完成交接儀式。同篇：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醴、威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從上文看來，祭祀宗廟的一切禮儀，成王都懂。成王一再命周公，居其身後行禮如儀。這些繁複的禮數，是否為一個年僅十歲的小孩子所能深悉者。且

周公攝政，原為成王年幼。而當成王十歲之年，即行復子明辟，是否太早一點？由此看來，足見呂氏春秋「周公抱少帝成之」之說，不够正確了。

3. 伊尹輔太甲，風亦不甚順：任先生以為，伊尹輔太甲，沒有遇到困難。周公輔成王，則遇到困難。此亦為一種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說法。殊不知伊尹所遇之困難，比周公還要嚴重。任先生指出：

「周公對成王訓政，猶伊尹之於太甲然。但伊尹是一帆風順的，周公却遇到了挫折。」伊尹與太甲的關係，始見於孟子萬章上。史記股本紀對此問題之講法，略同於孟子，而相異之處頗多。此處為節省篇幅，僅引孟子為論。孟子萬章上：

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

照此看來，伊尹之輔太甲，確是一帆風順的。問題是，孟子是講思想的書，而非講歷史的書。思想家喜歡闡劃史實，遷就已說。孟子這段話，實未必可信。據古本竹書紀年所載，與孟子之說，頗有出入。文曰：

仲壬

仲壬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

大甲

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

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孟子與竹書紀年兩種不同的說法，至於孰是孰非，甚難肯定。而在竹書紀年的講法，未能證實必誤之前，任先生斷言伊尹之於太甲一帆風順之說，便顯然有些站不住了。

4. 誥誡人民：任先生指出，周公攝政時期，有八篇文告，是誥誡人民的。

「周公東征，誅武庚、管叔……至於發表文告，如書經在周書中的『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等八篇，是誥誡人民而作。」

任先生這種說法，根據如何，我不清楚。但與我的看法，是頗有出入的。據我所知，這八篇文章，沒有一篇是誥誡人民的。「大誥」為周公東征之前，號召西方諸侯，出兵東伐的一篇文告。「康誥」為周公掃平殷亂之後，封康叔於衛，誥誡康叔如何治衛的一篇策命。「酒誥」是周公誥誡康叔如何使殷人戒酒的一篇誥命。「梓材」是周公誥誡康叔如何尊重小邦主權的一篇策命。「召誥」是召公主持周公就職東王典禮的一篇文告。「洛誥」是周公讓位於成王的一篇記事文章。「多士」是周公平殷之後，處理殷方中央官員的一篇文告。「多方」是周公平殷之後處理地方諸侯動亂的一篇文告。這八篇文章，層次之排列，不甚正確而文告內容，大致如此。

5. 誥誡成王：任先生認為：「無逸一篇，在於誥誡成王。」

此說亦不正確。而本篇問題甚大，非約言略語所可交代清楚者。要而言之，在周公他篇中，多有時間、事情與人物。只有無逸一篇，既無時間，亦無事情，除周公之外，別無其他人物。且是篇共分七段，每段之首，均為周公曰：嗚呼。周公在他篇文告中，並非沒有嗚呼，而絕無是篇之規律。

其次，他篇文義，均極艱深，無逸一篇，獨較淺顯。文章本身，對於後王，是有勸勉作用的。我對於是文之真偽表示懷疑者，不是認為該篇之意義不佳，及文字拙劣。而是認為周公在那個時代，沒有教訓後王的心情。

武王崩後，周室之政情，實為一個三家爭王的局面。成王以太子之位爭立。管叔以長弟之尊爭立，周公以相位爭立。結果周公以相位之便，捷足先登，引起管、成兩方之共憤。管叔一怒之下，要結連武庚伐周。周公迫不得已，才聯合成王一致對外。到了東亂削平，又到了周成王爭王的時代。周公居王位七年，讓位成王，自己屈居東王之位。周成王同時稱王，而東王之位，總是遜於西王的。周公雖屈居東土，仍然不容於成王，最後來了個認敗奔楚，這才結束了周室互爭王位的亂局，後來周公雖被成王請回，然爵土盡失，心情之苦悶可知。周公自即王位之日起，一直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下過日子，自己的王位，尚且不能確保，又那有心情為文教訓後王呢？

尚書周書中之偽作，據我當下的瞭解，當有三篇半。金縢、立政、無逸是三整篇。洛誥中間絕大部分皆出偽作，算是半篇。這三篇半偽作之由來及細節，待專文再詳。

周書中還有一個問題，也在此提出。自王莽之後，國人甚難讀通周書，是因為周書的篇目被人顛倒了。周書中與周公有關的幾篇文章之編目順序，

應當是這樣的：

①君奭②大誥③微子之命④康誥⑤多士⑥多方⑦酒誥⑧梓材⑨周官⑩洛誥⑪召誥
周書周公部分之編目，如作以上之調整，周公生平之事跡，就不難明白了。
任先生對於尚書，所知不多。持見多誤，那是甚難避免的。

三、梁啟超的反證

任卓宣先生，對於「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行政當國」之傳統說法，是深信不疑的。任先生指出「周公抱少帝而成之」、「周公對成王訓政」、「周公續文武之志，光輔成王」。由是可見，任先生對於「周公輔成王」，是採取支持態度的。而對於這個問題，大史學家梁啟超，於六十年前，却提出相反的證據。梁氏於其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五章第一節指出：

「……舊史稱武王九十三而終。藉令武王七十而生成王，則成王即位時已二十三，不可謂幼。七八十得子，生理上雖非必不可，然實為稀有。況吾儕據左傳，確知成王尚有邰、晉、應、韓之四弟。成王居長嫡，下有諸弟，嗣九十三歲老父之位，而猶在沖齡，豈合情理？且猶有極不可解者，書經康誥一篇，為康叔封衛時之策命。其發端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所謂「王」者誰耶？謂武王耶？衛之建國，確非在武王時。謂成王耶？康叔為成王叔父，何得稱之為弟，而呼以小子？然則繼武王而踐祚者，是否為成王？周公是否攝政抑更有進於攝政，吾儕不能不大疑。」

梁任公所提之論證，與我所為「武王崩成王不幼考

「一文之主旨，不謀而合。與「王莽與周公」一文之主旨，亦不謀而合。成王為長嫡，下有邰、晉、應、韓之四弟，這證明武王崩時，成王已不幼。康叔封於衛，是武王崩後三年，周公東伐成功之後的事情。康誥發端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處所說之「王」者，如謂武王，其時武王已崩三年，死人沒有講話之理。如謂成王，成王不當稱叔為弟，亦不當稱叔為小子。此一「王」者，最適當的解釋，莫過於周公。

梁任公雖為一位現代大史學家，然對於尚書，似乎用功不多。梁任公如果讀通尚書，對於周公成王間的關係，就不必存何疑慮了。

周公與成王間的關係，要分三點：

1. 武王崩後，周公自立為王。其時的周、成關係是：周公為君，成王為臣。禮記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周公朝諸侯時，周公南面稱君，成王北面稱臣。這是其時周公為君，成王為臣的鐵證。

2. 周公居君位七年，讓位於成王，周公自於東土稱王。其時的周成關係是：成王稱王，周公亦稱王。周書召誥：

太保……乃復曰：「……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

這裏是說，西土之王，由成王受命。東土之王，由周公受命。漢書王莽傳亦證明此說之不誣。王莽傳：

王莽始建國四年二月，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

「二后受命」者，成王、周公同時稱王也。

3. 周公為東王多年，東西不和，周公事敗奔楚。周

公失王後，爲成王爲君，周公爲臣時期。這時周公雖居臣位，然未輔佐成王。

如上述三點，爲周、成關係之要者。明白了上述之周、成關係，二千年來，周、成關係之謎，就不難全部豁然了。

四、周公輔成王觀念之形成

周公輔成王觀念之形成，可說是始於荀子，長於王莽，而成於東漢。

1. 荀子：在論語中，關於周公與成王之間的事情，半個字也沒有。就算有關周公的記載，也少之又少。論語：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而。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泰伯。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先進。

在整部論語中，有關周公的事情，除了這三條五十四個字，其他什麼都沒有了。

在孟子中，有關文王、武王、周公的事，都講得很少。而周公與成王的關係，隻字皆無。甚至孟子中，連成王二字都沒有。孟子公孫丑篇，對於周公繼承文、武之王業的問題，却是直言無隱的。公孫丑：

「……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治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

可見在孟子中，是承認周公繼承文武之王業的。承認周公繼武王受命，不僅孟子如此，荀子亦復如此。不過在荀子中，已使周公與成王間的關係，進入混亂邊緣了。荀子儒效篇：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

天下。

這證明武王崩後，周公繼承王位，沒有問題。而「成王幼」三字，便造成王莽後來捏造是非的張本。同篇又說：

周公歸周，反籍成王……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

這種說法，就更使周公與成王的關係，使後人無法理解了。

周公與成王的關係，最明白者應當是孔子，而孔子隻字不提。孟子是否明白周公與成王的關係，使人懷疑。因爲周公與管蔡間的關係，孟子並不甚了了。公孫丑：

陳賈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中這段話，便有些不當。使管蔡霍三叔監殷，是武王的任命，而非命出周公。怎可把管蔡之畔，歸罪於周公呢？這是孟子對於周初問題不甚明白的地方。孟子既然不明白周公管蔡間的事情，對於周公成王間的事情，也可能不甚瞭解。最大可能之一是瞭解而不方便講。

荀子生在戰國末期，其時周室已經沒有多大政治力量。荀子對於周室的是非，可以直言不諱了。而荀子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他的話是圍繞著他的政治思想發展的。不能把他的話視爲必定可信的事實。荀子王霸篇：

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爲，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之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

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

這段話，可謂對錯參半。文王用呂尚，沒有問題。武王用召公，也無問題。至於湯之用伊尹，成王用周公旦，其說便不一定正確。而荀子那樣講，有他的政治目的。就其政治目的而言，仍然是正確的。而這種不一定的講法，被有心人引用一下，問題就很大了。

雖說如此，導致周、成關係之混亂，荀子不過是一開端人物而已。

2. 王莽：周公與成王關係之混淆，主要形成於王莽時期。中國政治，自秦漢大一統形成之後，權勢之家，如欲取代舊主，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元后王氏，得壽八十四歲，歷經元、成、哀、平四帝，劉氏天下雖盡入王氏手中，然王莽如欲代漢自立，仍然困難重重。因之，便改造出一個周公來，照周公行事的規模，逐漸達到廢漢自立的目的。代王莽改造周公者，主要爲國師劉歆。關於劉歆的事，下面再談，現在先從漢書王莽傳中，觀察王莽如何歪曲周、成關係的事實。漢書王莽傳：

①平帝元始元年正月……羣臣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故周公及身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號曰安漢公。」

②太后……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爲三公，典周公之職……號曰安漢公。」

③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

④羣臣乃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

⑤皇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

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

⑥平帝元始五年，多……平帝疾……十二月平帝崩……葬乃遵（宣帝）玄孫中最幼廣威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

⑦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其令安漢公居攝踐詐，如周公故事。」

⑧……羣臣奏言：「……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禮記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由此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詐也……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

⑨王莽居攝元年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

⑩居攝三年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臣莽以爲元將元年春，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尙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

從如上十條看來，可以得出兩個概念。王莽時期，羣臣及莽上太后之書奏，有兩點內容：一方面是說周公輔成王，另一方面又說，周公自居攝之始即稱王。可見王莽時期之奏書，僅使周公與成王的關係，令人模糊不清，而周公以臣位輔佐成王的觀念，尚未形成。

3.劉歆：劉歆乃劉向之少子。成帝時與父同領校秘書。哀帝即位，王莽舉爲侍中太中大夫。莽篡立，引歆爲國師。後莽殺其三子，歆潛謀誅莽，事洩，自殺。

洩，自殺。

初，王莽欲謀篡立，建立了一個核心集團。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

其他數人的事情，暫置勿論。劉歆典文章一事，對於後代學術影響甚大。漢書王莽傳：

王莽地皇二年，天下大亂。是歲，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效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

祿曰：「太史令宗宜典星曆，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師虛僞以嫌名位……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

劉歆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一點，確是罪不容誅的。劉歆顛倒五經一事，據我所知顛倒是問題之一，舛亂是問題之二，僞造是問題之三。他經我不知道，尙書周書之中，有關周公部分，劉歆即做過如上手脚。尙書周書中，有關周公部分，周公稱王一事，本來是十分明顯的。經過劉歆之顛倒，舛亂與僞造，就使人沒有辦法了。

1.顛倒：尙書周書中，與周公有關篇目之順序，應爲君奭、大誥、微子之命、康誥、多士、多方、酒誥、梓材、周官、洛誥、召誥。劉歆把篇目列爲：大誥、微子之命、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君奭、多方、周官。那就使人難以明白了。

2.舛亂：所謂舛亂者，眞僞混淆之義。周書中，眞僞混淆之一篇，是洛誥。洛誥首尾二百零六字爲眞者，中間約四百字，均爲僞者。

3.僞造：周書之中，與周公有關部分，金縢、無逸、立政三篇，均爲全部僞造。造此三篇，目的有二：①金縢、立政兩篇，志在證明成王即位之時，是一孺子。②無逸一篇，志在說明周公爲此文教

導成王，使商書伊尹訓太甲之義。如果知道武王崩後的周、成關係，以及周公讓位成王，係逼於形勢諸問題，就可確知周公在這種情形下，不會爲文教導成王了。成王所信重者是召公，成王用不到周公教導什麼。此爲無逸必僞的關鍵問題。

劉歆之顛倒、舛亂及僞造尙書，固爲造成周公輔成王觀念之原因，另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石經之流傳。

所謂石經之流傳者，漢平帝元始元年，王莽命甄豐摹古文易、書、詩、左傳於石，名曰石經。這些石經中之尙書，有金縢、立政、洛誥三篇。在金縢、立政、洛誥三篇之中，有八個孺子，兩個沖子。這八個孺子與兩個沖子，就是周公所輔的成王。自東漢至今，近兩千年，在這兩千年中，所有的讀書人，均會讀到書經。書經之其他內容，讀者未必深知。而孺子、沖子代表年幼，却是童蒙皆知的。周公所輔者，是此孺子、沖子，於是周公輔成王的觀念，在國人心中，便深信不疑了。

五、周公出王東土之建樹

據如上之史實看來，可以確知武王崩後，周公繼承了王位。在位七年，讓位於成王。周書洛誥曰：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這證明武王崩後，周公爲王七年之論斷，是不錯的。周公讓位成王後，自己復王東土。與成王形成一種畫土分治的局面。同篇：

周公……曰：「朕復子明辟……我乃卜澗水東、澶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瀘水東，亦惟洛食。……」

這是周公與成王東西分治的證據。

周公之出王東土，就職典禮，是召公主持的。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至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若翼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

之後，周公於東土稱王。周公稱王東土，總計為時多久，我不知道。而由於成王與周公不睦，而致周公棄王奔楚，周公之王業便結束了。史記魯周公世家：

「及成王用事，人或誣周公，周公奔楚。」由此看來，周公奔楚一事，應當是不錯的。周公於稱王東土期間，政治上有何建樹，在周公本人的文獻中，找不到資料。而於成王與康王的策命中，却可看得很清楚。周公棄王奔楚之後，成王命君陳接替周公的職位。而君陳是否繼續稱王，不得而知。由君陳繼續治理東土，却是一點不錯的。周書君陳：

王若曰：「君陳……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

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是乂。」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

周公如何治理東土，無從深悉。從成王致君陳的策命中，足見成王十分服膺周公之治道，那是毫無疑

問的。

成王崩後，君陳繼續治理東土。到了康王十二年，君陳去世，康王才命畢公，接替是職。周書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在這裏我不想多講什麼，而從召誥、君陳、畢命三篇策命看來，足證周公曾王東土，並且政績昭彰，總是可以肯定了。

六、結 論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十點結論：

1. 武王崩時，成王不幼。

2. 武王崩後，繼承王位者，是周公，而非成王。

3. 周公在位七年，讓位於成王。

4. 周公讓位成王後，自於東土稱王，都洛，與成王畫土分治。

5. 周公於東土稱王期間，與成王不睦，後來棄王奔楚。

6. 再後成王從楚國迎回周公。

7. 周公返周後，未聞曾任何等職務。

8. 周公畢生，未嘗一日輔佐成王。

9. 周公輔成王之觀念，係由荀子、王莽、劉歆多方之偽說，逐漸形成。

10. 此一觀念，主要形成於歷代學人，讀不懂尚書，以訛傳訛所致。

最後，特別說明一點：我爲此文的目的，志在說明周公的本來面目，不是歷來學術界所傳的那個樣子。周公的原始形象，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輕易恢復的。要而言之，只要知道「武王崩時，成王不幼，周公從來未曾輔過成王」，周公是一位空前絕後的聖王，而不是一位代主行事的聖臣就够了。至於周公之諡號曰公，而非曰王者，那是一個細節問題，留待另文討論。

文武周公合論

任卓宣

引言

從來論道統的人，都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爲言。前四人，我已論過了。現在先論文、武、周公三人。湯是商朝，還有伊尹，我再論及高、傅。現在說周朝。文、武、周公有密切關係，自應一併論之。

當然，孟子在一個地方，只說及文王。例如：『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①但在另一地方，則說及武王和周公。例如：『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②這些話，顯然也有道統底意味。那末文、武、周公就是道統中人了。還有，這裡不必盡說。

以後，就分論周朝底文王、武王、周公三人吧。爲甚麼文是文王，武是武王呢？以後自有論及之時。這裡只說文、武乃文王、武王之簡稱便可以了。

一、文王論

先論文王。這不僅在生年上，他是首出之人；即在周朝之文、德上，亦造乎其極。看孔子吧。當他以貌似陽虎而被圍於匡時，却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③可見孔子是直接繼承文王的了。那末文王之重要爲何如耶！則其來源有談及之必要。

司馬遷說：『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④『娶有邠氏女曰姜原』，生棄，『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後封棄於邠，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復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歸屬焉。周道之興自此始。』⑤

公劉以後，八傳而至古公亶父，『復修后稷、

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燕育夷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携幼，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⑤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⑥爲何？這在遠之是后稷、公劉之發展，所謂祖德流芳。近之是古公和太姜、季歷和太任之所致。通常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鳳生兒打洞洞。』那末賢生賢，甚至賢生聖了。此在太任是可能的。『詩經』論文王，着重太任。這就可研究一下了。

『詩經』一則說：『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⑥再則曰：『思齊（音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太王之妃），京室之婦。